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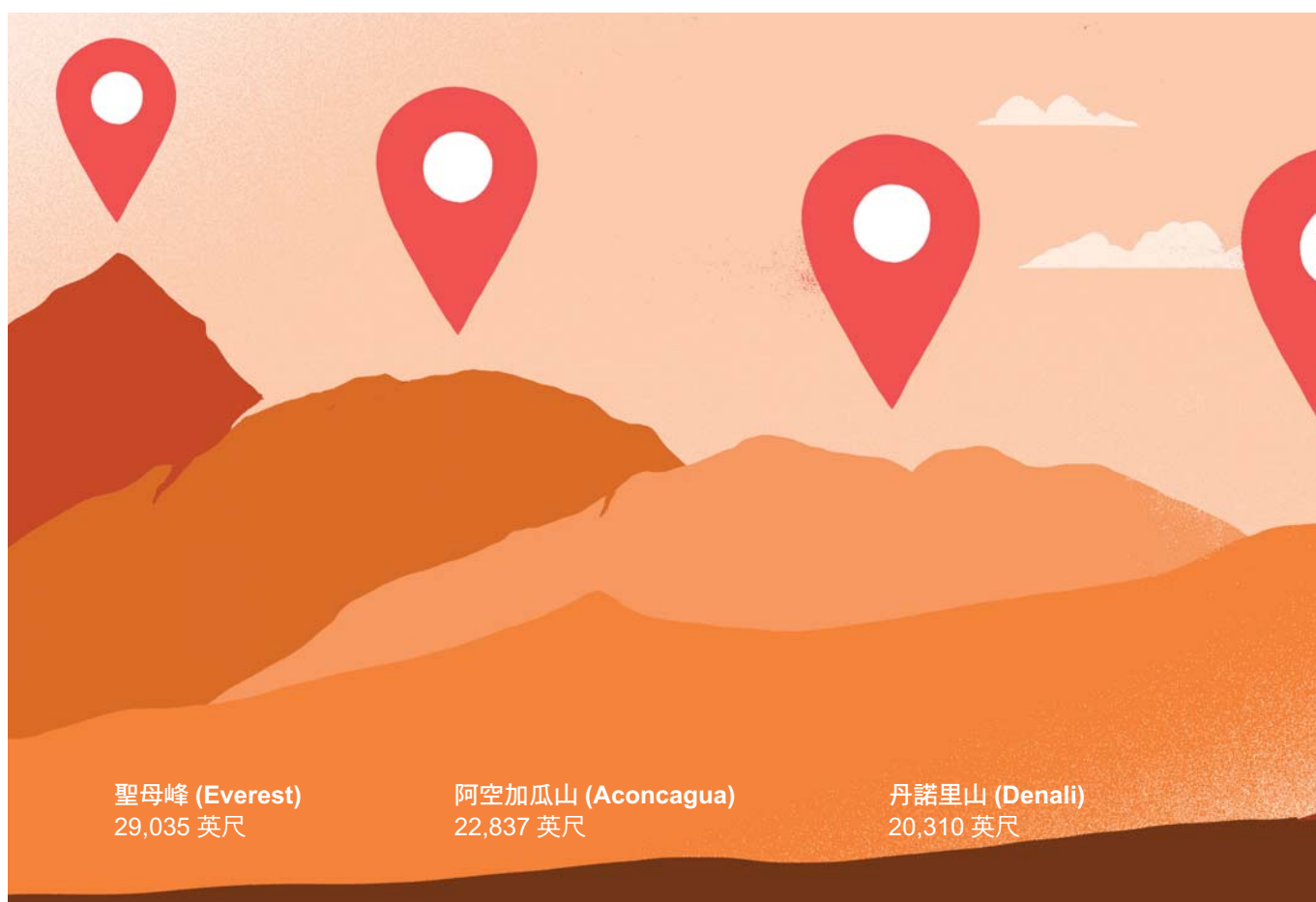
繪圖：SEBASTIEN THIBAULT



平凡的扶輪社員
發現他們處於
不平凡的情況。

由他們親口說出，
告訴我們
那是什麼感覺……。





聖母峰 (Everest)
29,035 英尺

阿空加瓜山 (Aconcagua)
22,837 英尺

丹諾里山 (Denali)
20,310 英尺

那是什麼感覺……

征服七大高峰

喬伊絲·阿尚姆
Joyce Azzam
黎巴嫩貝魯斯
(Beyrouth) 扶輪社

我在 2005 年開始健行，幾年後我得到獎學金到歐洲讀書，在阿爾卑斯山區度過許多時光，才認真看待攀爬高山這件事。2012 年，我產生征服七大高峰——各洲最高峰——的夢想。可是這是我原本意想不到的事。

我出生在黎巴嫩內戰期間，童年的唯一記憶就是在從一個防空洞逃到另一個防空洞，在地底下生活。我家有 5 個小孩，家境清寒。我父親是建築油漆工，也兼做工程。對

我們來說，最要緊的事情是吃飯及存活，之後則是受良好教育及賺錢謀生。沒有人會想爬山的事。

我向來怕高，也從來不是運動型的女生。事實上，我還有個生理障礙叫「關節過鬆症」，就是我腿部的關節是鬆弛的。我的膝蓋會向後彎曲，看起來很奇怪，小時候其他孩子會因為這點霸凌我。他們甚至叫我「外星人」。我跑步無法超過 50 或 100 公尺。我每天會挑戰自己跑遠一點，用操場的柱子當指標。我想要告訴自己，我在那些孩子面前很強壯。或許就是從那開始，我產生想要爬山的慾望。我想要告訴每個身體有問題、或是有其他障礙要克服的人，如果他們夠迫切想要某樣事物，他們便

能成就不可能。這件事成為我的使命。

我喜歡親近大自然；我會感覺比較接近自我。當我最初宣佈要爬七大高峰，朋友都認為我瘋了。他們說我會浪費許多你事業的時間。我的父母則說：「你現在是建築師。該是結婚生小孩的時候了。」對他們來說，這是女人真正該走的路。我明白他們只是關心我。爬山需要很多時間、金錢，及訓練，而我什麼都沒有。當然我也有懷疑的時刻，我想要放棄，因為我眼前只能看到一道高牆。可是我會做的是在牆上鑽一個小洞，然後慢慢把它挖大，直到它可以成為一道我走得過去的門。

2016 年年底，我放棄了。我待在圖書館裡寫我的



吉力馬札羅山 (Kilimanjaro)
19,340 英尺

厄爾布魯士山 (Elbrus)
18,510 英尺

文森山 (Vinson)
16,050 英尺

查亞山 (Jaya)
16,024 英尺

博士論文時，我看到臉書有一篇關於拉哈·莫哈拉克 Raha Moharrak 的貼文，她是第一位攀登七大高峰的沙烏地阿拉伯女性。這件事一直在我腦海裡盤旋。我半夜醒來，擬定了一個全新的計畫。我給它取名字，並選定圖形標誌。通常你會到完成夢想才告訴別人，可是就我而言是恰恰相反。如果我告訴別人我的夢想，我就必須讓它實現。

有件事很有幫助就是我開始到學校服務。我會展示我爬山的照片給學生看，照片裡的我總是拿著黎巴嫩國旗。可是孩子仍會問我：「你是黎巴嫩人嗎？」因為他們從沒看過站在懸崖邊、攀附在岩石上，或穿著防滑釘鞋爬山的黎巴嫩女性。我這麼說，我將會成為

這些孩子的模範。一個女孩告訴我：「我要成為第二個這麼做的黎巴嫩女性。」這多麼美好，讓我明白我可以憑藉這個夢為其他人做許多好事。夢想如果沒有服務層面便不完整，那就是我為何成為扶輪社員。因為我相信竭盡所能來回饋及服務社會的價值。那也是為何我認為扶輪不只是社團而已。它是讓我在世界各地都擁有家人的大家庭。

聖母峰是最後一座高山，在我出發之前，我很擔心，因為我沒有時間做充分的訓練。可是我的哥哥喬治斯——他是最有力的支持者——說：「你辦得到。你已經訓練很多年。慢慢爬，就會習慣。」我就是這麼做。我跟烏龜一樣爬上聖母峰。

在山頂的那一夜，人潮川流不息。我們必須跨過在半途喪生的人的屍體。那非常非常困難。可是我記得那片風景的美麗，那黎明的藍色。我爬過七大洲的 28 座山，站在喜馬拉雅山頂峰是無與倫比的。喔，天啊！

可是對我來說，重點不在聖母峰或征服高山。重點在實現攀登七大高峰的夢想。重點在那個不被允許做夢的女孩——因為我來自的地方、我的性別、我的社會地位、我的祖國、我的身體限制。重點在多年的努力及逆境。我內心覺得完滿。這不只是屬於我的時刻，也屬於世界各地的女人及女孩。它證明了你可以忠於自己的夢想。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那是什麼感覺……

洗手參與 世界第一 心臟移植

迪恩·羅爾斯 Dean Rohrs
加拿大卑詩省蘭格利中央
(Langley Central) 扶輪社
前國際扶輪副社長

1967年12月，我即將完成我在南非開普敦葛魯特·舒爾醫院 Groote Schuur Hospital 的護士訓練。當時，克里斯蒂安·巴納德 Christiaan Barnard 正率領一支團隊，希望能在該院完成第一次人類心臟移植手術。各地醫療小組都想搶先完成，因為這是一項如此重大的醫療成就。有天晚上我在值「候補班」時被叫進手術室。我剛好在值班只是純粹巧合而已。

你要瞭解，像這樣的手術，手術室裡會擠滿人：外科醫師、他們的助理、麻醉師、操作維持病患生命的葉克膜機器的人。我的工作只是做些該做的事。我計算手術期間用到的吸血棉球，確保沒留在病患的體內。我拿水。外科醫師會靠過來說：「請幫我擦額頭。」因為他們一直在冒汗。

在此刻，你瞭解到你是在做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可是你十分投入這個過程，以致於你只是確認自己有在注意，隨時填補工作空缺。我認識接受心臟的人與他的家人，他已經



住院很久，顯然生命垂危。他可能只能再撐一、兩天。剛好有位年輕女子出車禍捐出心臟。

因為手術帷幕和靠在病患周圍人數的關係，我無法直接看到胸腔。可是我確實看到每一樣進進出出的東西。我看到外科醫師用來縫合組織及出血處的針頭。我看到吸血及燒灼。我看到植入的心臟。當時取心臟的方式與現在大不相同。他們必須把心臟從一個手術室拿到另一個手術室。我看到它被拿進手術房，放入病患體內。當然這很戲劇化，因為你把一個可以賦予新生、卻來自一個付出生命的人的東西，放進某人的胸腔內。當我看到那顆心臟，心裡只想著：「喔，天啊！那是某人的心臟。」

我們的手術不是人類首度嘗試心臟移植。之前曾有人進行，可是病患於手術中死亡。我們的病患活了18天，而且能夠跟家人對話。最後

撐不下去的不是它的心臟；他死於肺炎，部份原因是當時的免疫抑制藥物不像現在這麼有效。可是因為我們的病患活下來了，這個手術成為國際新聞。醫療小組沒有人預期到反應會這麼大。它立刻成為國際知名的事件。

這一切發生時我只有25歲——那是50年前，天啊！有時候人們大驚小怪時我會覺得有點難為情，因為我只是顆小螺絲釘。可是那個手術確實大大影響醫學史的發展。我必須把功勞歸給巴納德教授。他在工作上不是一直很好相處，可是他所做的事非常需要勇氣，因為當時很多人主張心臟是碰不得的，在文化及宗教方面那都是禁忌。那次手術改變人們對心臟的看法，它改變了我們今天治療心臟的方式。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對抗疾病是扶輪的六大焦點
領域之一。詳情請洽
rotary.org/our-causes。

那是什麼感覺……

在傳奇的世界盃比賽踢球

馬紐爾·阿莫羅
Manuel Amoros

法國隆河上的艾里斯
(Aries-sur-Rhone) 扶輪社

1982年，我20歲，首度獲邀加入法國國家足球隊，參加世界盃足球賽。我獲選為聯盟最佳年輕球員，並在準決賽中踢進值得紀念的罰球。

可是我生涯的高潮是我們4年後到墨西哥參加1986年世界盃時的那場半準決賽。那場比賽的對手是巴西，時間是6月21日中午，地點在瓜達拉亞拉的耶里斯科球場。天氣酷熱潮溼，我們還得對抗污染和高海拔的不利因素。他們提供氧氣筒幫助我們對付嚴苛的環境。我之前不曾看過用這個，之後也沒有。

有些人把法國及巴西之間的比賽稱為「夢幻比賽」。巴西隊的教練說他認為它相當於這次錦標賽的決賽，一位記者寫到之後發生的一切就沒有那麼精彩。比賽前兩小時，場地已經大約有3萬名球迷——最後暴增為6萬6千人——而大部分都是巴西人，邊呼口號邊跳舞。所以巴西顯然有主場優勢。

為了這場比賽，我們教練亨利·米契爾 Henri Michel 改變策略，告訴我們一些人要更換位置，我們都搞不清楚狀況，但不久便明白這新的制度是行不通的。巴西隊在開賽17分鐘後就得分。我們必須快速重組，這在比賽中並不容易。我們回到我們通常的位置，就在半場休息前不久，我們隊長米歇爾·普拉提尼 Michel Platini 得到一分。

在當時，喝水暫停是聽都沒聽說過的事，而且以比賽的高水準來說，球很少出界。我們的醫療小組會用小塑膠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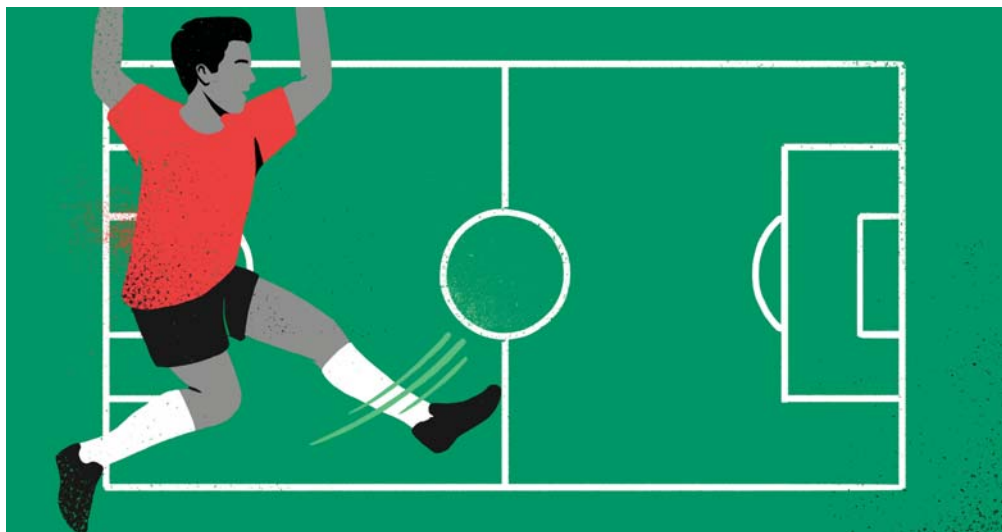
裝水，確定裁判沒在看時從球場邊丟給我們。大約正規賽時間結束前15分鐘，比數仍然是1比1平手，我們的守門員約爾·巴茲 Joel Bats 犯規被判罰球。巴西球員開始慶祝，好像他們已經贏得勝利，我認為這樣很自大且相當自以為是。我是對的：西科——在巴西等同於神的球員——負責罰踢——約爾擋下這一球。

我們在第二次延長賽時有很棒的得分機會，攻擊手布魯諾·貝龍尼 Bruno Bellone 與巴西守門員一對一。布魯諾被犯規，沒得分；更糟的是，裁判沒有吹犯規而是判定雙方要PK。

因此，在辛苦120分鐘之後，比賽要靠PK來決定，這等同樂透，完全無法依賴。我們輪流踢，每隊各踢5球。4年前，在半準決賽對抗德國時，我第二個踢且進球了。出於迷信，我要求再次排在第二個，也順利進球。之前連續三球都沒進——法國一球，巴西

兩球——可是最後，我的隊友路易·費南德茲 Luis Fernandez 踢進勝利的一球。多麼難忘的時刻！我們擊敗巴西。之後我再也沒有經歷過更興奮的感覺了。

口述由 Alain
Drouot 整理



那是什麼感覺……

滑進扶輪的 心裡

古伊多·法藍塞切提
Guido Franceschetti

羅馬國際
(Rome International) 扶輪社

存活唯一方法就是放鬆每一塊肌肉，然後忘記身體。疼痛依然在，可是我學會客觀看待，就像個旁觀者一樣。我在多次手術後，必須躺著完全靜止不動，我粉碎的骨盆用鐵板及螺絲固定在一起。我只能用一隻手；另一邊的肩膀也骨折。椎骨及肋骨骨折讓疼痛加劇。

意外發生時，我和朋友在法國的 (Val d'Isere) 滑雪。前兩天很棒：雪況很好。第三天，起了濃霧，因此我們決定選擇比較容易的路線下滑後就結束那一天。滑雪道很平順，完全沒有人。我在前頭，所以我往右切回頭望是否能看到大家。我往左切再回頭看。他們在哪裡？

當我再度向前看，正前方有一個標示柱。我試著急彎來避開它，可是沒用。在僅能控制的小小範圍裡，我試著從側面避開。可是太遲了——我用力撞上柱子。

我的朋友柏納德最先發現我。我超級痛而且好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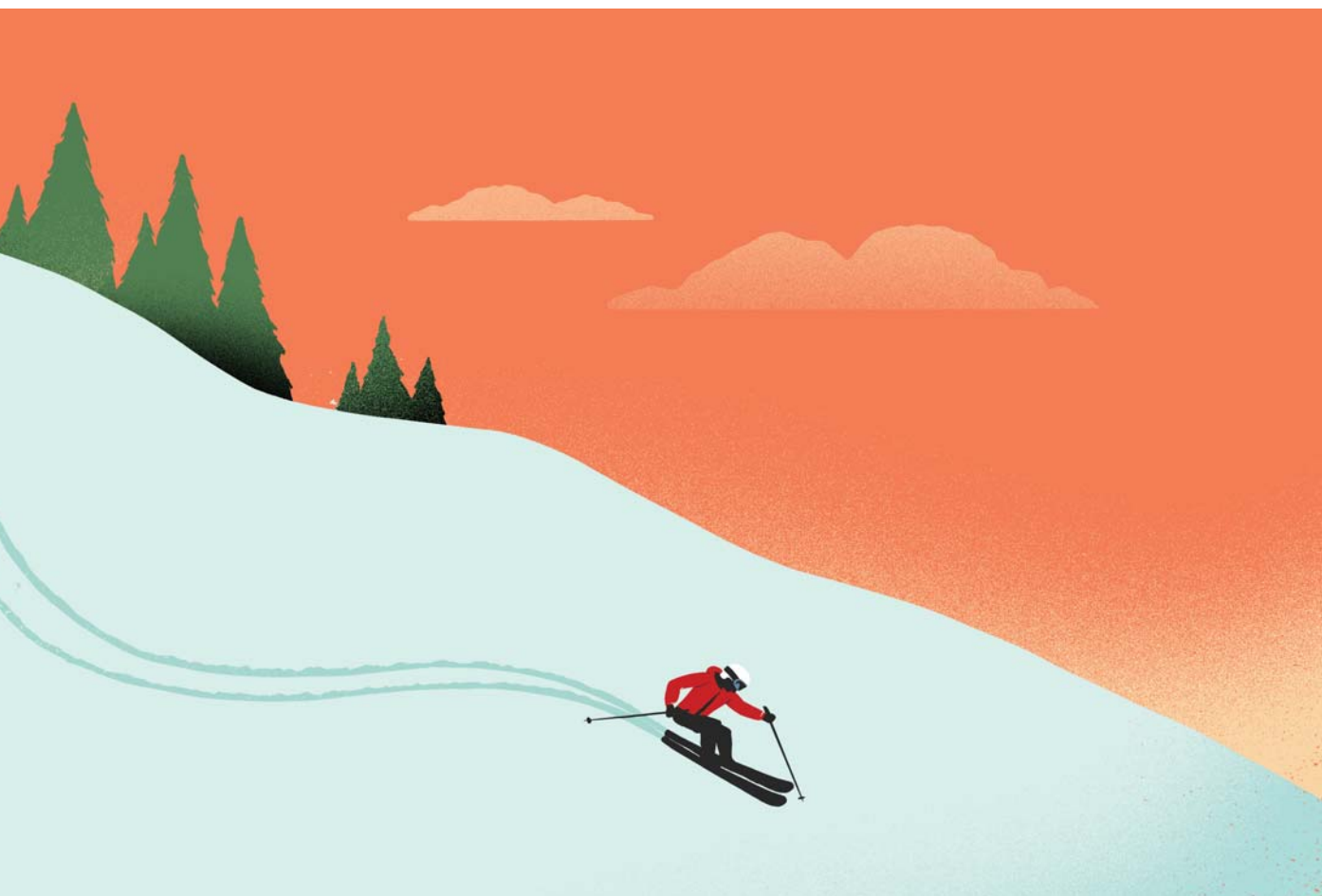
把他的擋風衣披在我身上，然後求救。霧太濃，直升機無法用空吊方式載我離開山區，所以緊急應變小組把我抬上一輛雪橇，載我去搭纜車，然後再一路送達一部等待的救護車。我的傷十分複雜，鄰近兩家醫院都無法治療，因此我被轉送到葛蘭諾柏 (Grenoble) 的一家大學醫院接受手術。

當時我太太丹妮拉 Daniela 人在羅馬。她趕往法國，可是等到她抵達葛蘭諾柏，我已經進入手術房。手術預計會非常久，所以工作人員建議她返回飯店。我不敢想像她的感受，在異國獨自一人，不安孤單，

面對我的不明狀況。

回到飯店，丹妮拉注意到扶輪標誌；門房告訴她葛蘭諾柏 - 貝勒東尼 (Grenoble-Belledonne) 社在那裡集會。事實上，他們的例會正要開始。丹妮拉也是扶輪社員，這個時機簡直是老天恩賜。她需要待在友善的面孔身邊幾小時，即使他們是陌生人。她決定出席。

該社社員熱情歡迎她，當她告知他們我的意外時，他們展現出身為扶輪一份子的意義。例會的主題從扶輪社事務轉變成如何幫助丹妮拉。一位社員主動表示她女兒的公寓暫



時無人居住可供她使用。另外一位載她回醫院。當她後來告訴我一切時，我很感動。我可以看得出來丹妮拉在得知她可以依賴朋友——即使是素昧平生——來協助她時，便獲得力量來處理因我健康所產生的恐懼。

接下來幾天，在我接受更多手術時，葛蘭諾柏的扶輪社員協助丹妮拉安定下來。在她進行文書作業取得我留在法國的授權與官僚機構發生問題時，他們協助解決。在醫院住了兩個星期後，我被轉院到葛蘭諾柏市郊山區的一處復健診所。我的醫師認為我復健期間

最好不要返回羅馬而是待在附近，以便他們監督我的進展，必要時得以介入。

我在法國靜養了 4 個月。許多時候我完全不能動。我受到妥善照顧，丹妮拉得以來回羅馬來看我，可是我仍然待在一個附近沒有任何家人的異國。復健診所環境優美，可是抵達的道路很蜿蜒、漫長、從葛蘭諾柏前往也不方便。可是扶輪社員從沒讓我缺人陪伴。他們的到訪讓我得以一窺外在世界，對此，我深表感激。在他們任何人來訪之後，當然，都會轉告丹妮拉我的最新狀況。

最後在我開始能坐著輪椅四處移動時，我向我的醫師請求許可出席葛蘭諾柏 - 貝勒東尼扶輪社的例會。在淚眼婆娑中，我感謝他們照顧我及我的家人。

自我發生意外以來已經將近 12 年。我已經康復，我們和許多葛蘭諾柏扶輪社社員的友誼一直延續下來。我一直相信扶輪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友誼。我很幸運能親身見證非常感人的實例。

口述由 Vanessa Glavinskas 整理

那是什麼感覺……

造訪美國每一個國家公園

米卡爾·梅爾 Mikar Meyer
大使獎學金學生

幾乎可以確定我搞砸了。在開著一輛破破爛爛、裡頭的太陽能冰箱經常壞掉的廂型車，跋涉數萬英里之後，我終究無法達成我的目標。開著水上飛機，載著我來到美國最偏遠的國家公園——阿拉斯加州的阿尼亞查克國家紀念碑及保護區 (Aniakchak National Monument & Preserve) ——的飛行員剛剛告訴我，因為能見度不佳，他必須取消我們原定在底下火口湖降落的計畫。接著他說：「我們說好的，無論我們有沒有降落，你都必須付我全額。」

2年前，30歲時，我展開連續造訪美國所有419座國家公園的漫長旅程。這趟旅程最後將花費3年的時間，走過7萬5,000英里（約12萬750公里）。以前不曾有人這麼做過。從美屬維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 到南達科他州的惡地國家公園 (Badlands) 到佛羅里達州的乾龜群島 (Dry Tortugas) 等，我的國家公園巡迴之旅跨越陸、海、空。我仰賴罐頭食品維生，忍受暴風雪及酷熱，修理爆胎及漏油，還

有數十次為了省錢在廂型車上過夜被警衛趕出停車場。此時看來我的名字會出現在收錄記錄的書籍裡，以星號標註說因為天候不佳無法進入阿尼亞查克火山口——即使我已經付了全額。

飛機駕駛說：「好吧！再最後一次瞧瞧。」他把飛機開入濃厚的雲層，看看是否還有一絲機會這個濃密的積雲不會一路延伸到這個阿留申山區湖泊的湖面。可是極目所望，都是一片密實的灰；這片景色適足以呼應我的失望。就在駕駛加緊油門要掉頭返航時，一道陽光出現在我們遠遠的下方，像支火把般閃耀，照亮烏雲籠罩下的一片湖水。我們兩個都發出歡呼。5分鐘後，水上飛機順利降落在這個位於3,500年前形成之火山口的驚喜湖 (Surprise Lake) 上。我感覺彷彿神明降臨來相助。

這種心靈連結的感覺一直引導著我。我爸爸是路德教派的牧師，所以或許這也是可預期的。當然，它在我目前的追求中扮演某種角色。我父親在58歲時過世，生前很喜歡公路旅行，我進行這趟旅行有很大部分是為了紀念他。在心靈上，他陪伴我走過每一段行程。他的早逝更讓我堅信追求夢想這件事不可延遲。

如果說我父親提供我所必要的精神啟發，現實面我還是需要尋找資金。就讀田納西州曼菲斯大學時，我獲得曼菲斯中央 (Memphis Central) 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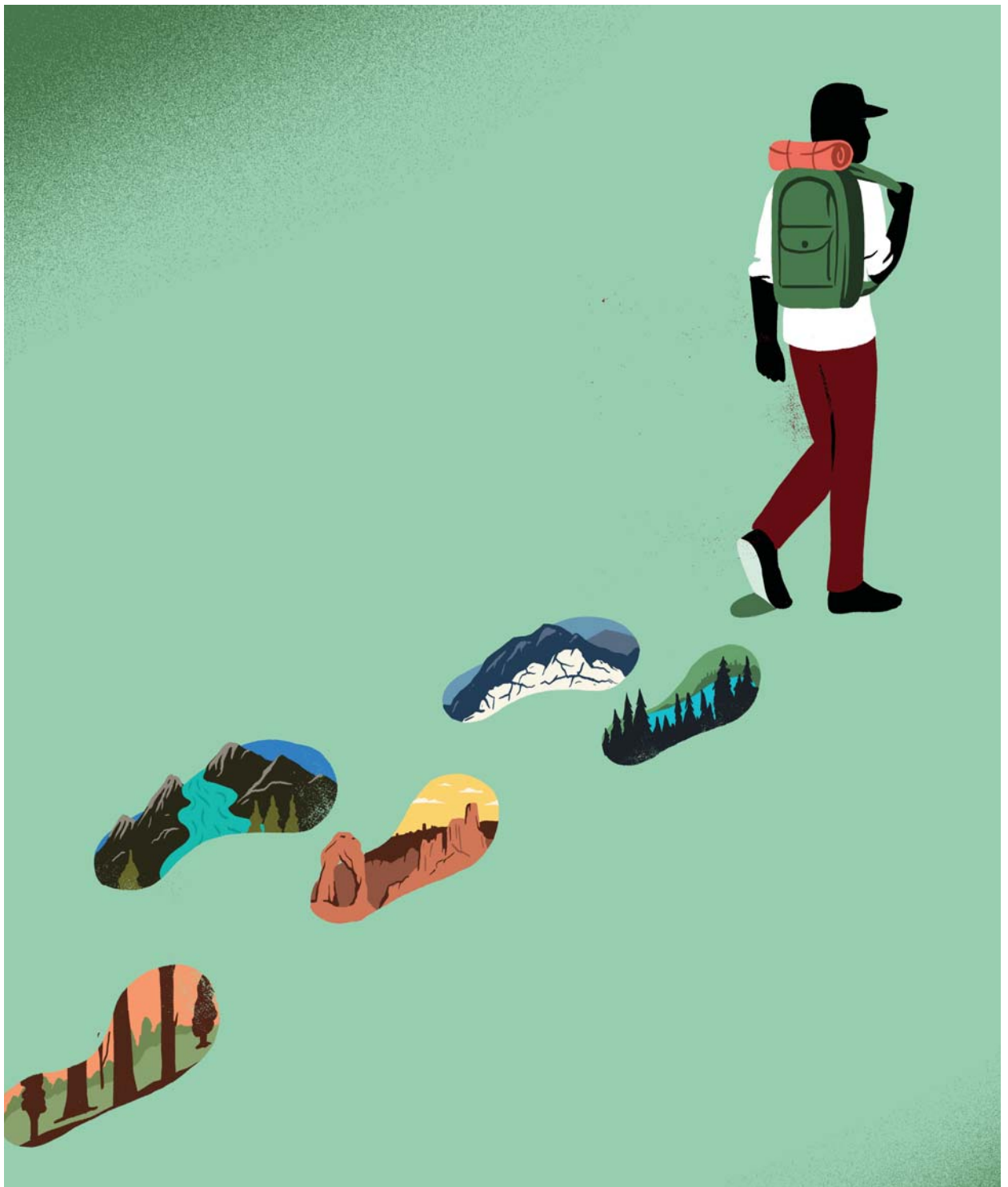
輪社提供的大使獎學金，讓我能夠到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克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就讀，研究假聲男高音的聲音訓練。我當時不知道這筆獎學金會——間接地——幫助我籌措國家公園之旅的經費來源。

我或多或少算是自「唱」更生。除了我10年所存的錢之外，我還在教堂舉行獨唱會，站在講壇前談論我的旅遊經驗，分享我的冒險心得，然後等著打賞。

我談論我在華盛頓州的奧林匹克半島，開車穿越重重遮蔽視線的灌木林時，突然感覺到地勢下墜。當我往車窗外一看，我的廂型車的前輪已經衝出懸崖外。我推開駕駛座旁的門，過往人生如跑馬燈閃過腦海。所幸，有幾個人出現把我和廂型車拉到安全的地方。

我也講述我在科羅拉多州西北部的恐龍國家保護區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也是我最喜歡的國家公園)，有一隻野雁——不久後被取名為喬治——加入我們的泛舟小隊。它跟我們一起睡覺，跟我們一起開趴，揮著翅膀陪我們健行走過陡峭的峽谷。我們最後開車離開時，喬治發出鳴叫，尾隨著廂型車。

我到教堂的行程也讓我有機會開誠布公以同性戀基督徒的身分說話。我生長在保守的內布拉斯加州，青少年時性傾向的問題讓我很掙扎。要出櫃是非常困難的事。你必須選



擇當同性戀而不當基督徒，或是當基督徒而不出櫃。現在，20 年後，我有機會講述我的故事，並獲得真誠的接納。

從很年輕開始，我就有強烈的慾望要看看這個世界。扶輪催生我的旅行，讓這件事

變可能。常有人問我是否想要再來一次。馬上出發，我回答。我被賦予機會追求我的願景，擁抱我真正的本質，並與接納的觀眾分享二者。

口述由 Stephen Yafa 整理

LGBT 扶輪社員及友人扶輪
聯誼會致力於為 **LGBT**（女
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
性戀者、性別轉換者）創造
一個包容且接納的社會。
詳情請至 [facebook.com/
LGBTRAFRotaryFellowship](https://www.facebook.com/LGBTRAFRotaryFellowship)。

那是什麼感覺……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逃過被俘

今泉誠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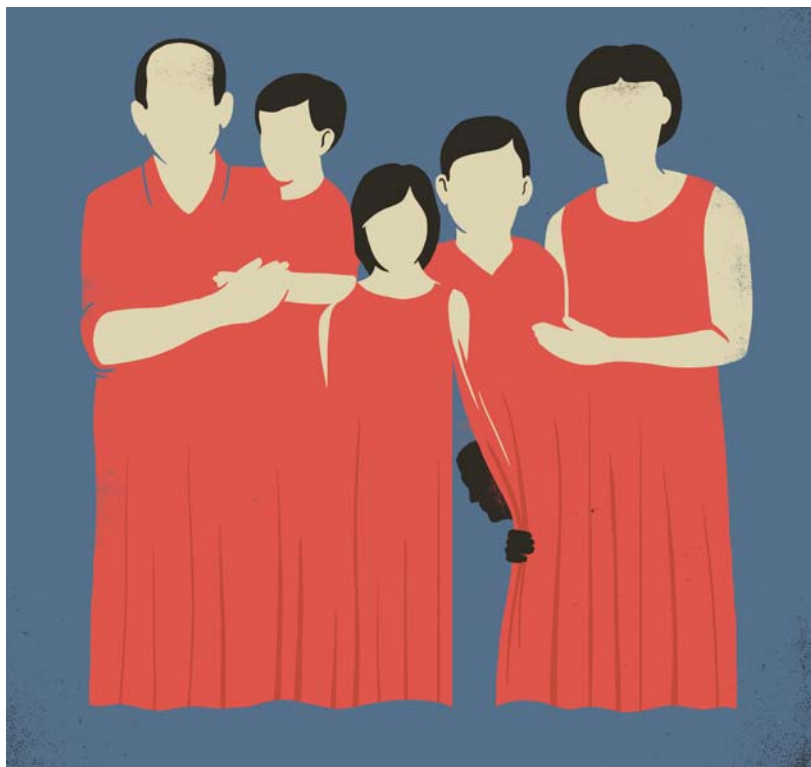
日本川越扶輪社

我的鞋子破損不堪，必須用繩子綁起來才不會散開。有時候我必須吃小動物，甚至吃草。可是我不斷前進，希望能抵達一個安全的地方。我每天都在想我很可能會死。明天吧，我會跟自己這麼說，我不在這個世界。

我同單位的大多數人都在 1944 年印度與緬甸邊境的英帕爾 (Imphal) 戰役中陣亡。他們遭英國軍隊包圍，不是戰死就是淪為俘虜。我不在其中是因為我奉命去調查我們要如何橫渡附近的一條河川。如果情況不同，我可能早也已經身亡。

英國人在搜尋任何殘存的日本士兵，所以我撤退到緬甸山區躲藏。此時已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日本正逐漸失去戰力，因此我們的食糧與軍備已經很久沒有補給。我幾乎一無所有。我一天步行 15 英里（約 24 公里），走過各種困難的地形。

最後，我發現一棟屋子。它只有一個房間。如果你打開門，整個空間一目了然。可是這家人收留我。他們給我東西吃，英國士兵來時，他們



叫我躲到床底下。英國人走了之後，他們才叫我出來。

我一直躲到大戰結束。我繼續前進，不管到哪裡，都有人家收留我。我不擔心有人會通報英國人。後來我聽說許多當地人藏匿日本士兵的故事。我所到之處，都聽過這樣的故事。他們對我們非常仁慈。

我在 1946 年回到日本，一切都得重頭開始。多年來，我辛苦在沒有人要耕種的土地上種植。大家都很窮，時局很艱困。可是我從經驗知道如果我想要活下去，就找得到方法。我有存活的力氣與意志。我也開始思考要如何回報緬甸人的仁慈。

我開始從事酪農業，生活穩定下來，所以我成立今泉紀

念緬甸獎學金基金會。這項獎學金是針對前來日本讀書的緬甸學生。1989 年，我們發出第一批獎學金。今天，大約有 200 名學生獲得過這項獎學金。

我輔導過許多這些來日本讀書的學生，我的目標是讓他們擁有把繁榮發展帶回他們國家所需要的技能。投資下一世代是我所能想到回報收容我的陌生人的最佳方式。為了讓我的同胞能安歇，我希望這一世代能把和平及繁榮帶到緬甸。

口述由 Vanessa Glavinskis 及 Reiko Takiyama 整理

促進和平是扶輪六大焦點領域之一。關於促進和平的不同方式請參見 rotary.org/our-causes。

那是什麼感覺……

接待兩個世代的青少年交換學生

蘭迪·威爾森 Randy Wilson
7150 地區總監

珍妮特·威爾森 Janet Wilson
紐約索夸伊特
(Sauquoit) 扶輪社

1988 年，一名來自印度，名叫安納特·阿格拉瓦 Anant Agrawal 的 15 歲青少年交換學生抵達位於紐約州中部的 7150 地區。他的第一個接待家庭在他抵達時剛好家裡在施工，所以他住在我們家約 6 個星期。

我們家新增建 2 間臥房，安納特幫我們粉刷油漆。他很開心能幫我們的房間完工。他在學校表現優異，他參加扶輪計畫，然後返回印度。當時沒有任何社群網站及電子郵件，雖然我們變得很親近，我們之後還是失去聯繫。我們養育子女，他回家去讀大學，最後他結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們家接待過澳洲、丹麥、芬蘭、德國，及荷蘭的學生。我們總是樂於瞭解學生祖國的文化，看到他們在此期間日漸成熟。對這些學生的許多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長時間遠離家人。看到他們在這一年的時間不斷成長實在很令人

驚喜。對接待家庭來說，這是擴展世界觀的好機會，實際上就像是認養一名小孩住在家裡 3 或 4 個月。

不是每次交換都很完美。你必須瞭解這些小孩會想家，要知道如何和他們一起克服。接待家庭要努力；交換學生也要努力。可是一般來說，接待家庭如果不把學生看作客人，而是看成家人，就會找到一種連結。

在 1989 年到 2006 年之間，我們沒有和安納特聯繫。後來包含古吉拉特邦 (Gujarat) 部份在內的 3060 地區派送兩名學生到 7150 地區。我們詢問那些學生是否認識安納特。其中一位記得有次在扶輪社演講後，與他交談的一名男子告訴他：「我真的替你感到興奮。我大約 18 年前也去過紐約州中部。那裡冬天很冷，可是人很熱情。你會有很美好的一年。」

當然，那就是我們的安納特。我們重新連絡上，2011 年，他和他的妻子及兩名子女來到美國，在我們家住了一個星期。他們參觀他之前就讀的高中。大家都很開心。然後

在 2014 年，我們到印度參加他侄子的婚禮。我們在那裡待了 9 天。

安納特的兒子以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身分到巴西，他女兒亞蘿喜 Aarohi 也提出申請。2018 年秋天，我們所屬的索夸伊特扶輪社接待她。她住在我們家，就是她爸爸 30 年前協助我們粉刷的那一間臥室。她參加學校戲劇的演出，她修讀資優班的課程。她和其他約 80 名學生一起畢業。然後她返回印度。雖然看著她離開很傷心，可是我們知道我們會再見面。

當我們跟潛在的接待家庭談話時，我們都會告訴他們關於扶輪青少年交換最棒的一點：如果你同意在自家接待外國學生幾個月，你就會在餘生中把他們放在心裡。

口述由 Frank Bures 整理

扶輪青少年交換自 1975 年起
開始拓展參與者的視野。
參加此計畫的詳情請見
rotary.org/youthexchange。



那是什麼感覺……

撐過颶風

麥克·史塔佛德
Mike Stafford

巴哈馬群島自由港
(Freeport) 扶輪社

我們知道颶風要來，而且威力很強，因此我們有在做準備。我經營一間小型造船廠，我們停止防颱工作是因為風變強到我們無法把船拉出去。我們以前也經歷過颶風，因此我們本來就備齊所有的補給品，還有電池。我們唯一必須買的東西是發電機用的汽油。我太太把所有的窗戶擋風板都拉下來。

一聽到馬桶發出咕嚕水聲，我知道我們必須撤出主屋。我從沒有擋住的小小颶風觀察窗往外看，看到水已經一路漲到我們的後陽台——那離我們附近的運河堤防約 160 英尺（約 48 公尺），高出海平面 22 英尺（約 6.6 公尺）。我跟我太太說：「親愛的，我們得撤退了。」這要花一點時間，因為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兩隻貓塞進布袋，而當外頭有時速 180 英里（約 288 公里）的狂風在呼嘯著，貓咪可一點都不想被塞到布袋裡。

我們去我們比主屋高 150 英尺（約 4.5 公尺）的小屋。我們躺在床上，聽著狂風怒吼。大約是凌晨 3 點，我們兩手牽

著手，無法入睡。我嚇死了，因為你可以聽到龍捲風呼嘯而過。我太太說：「親愛的，我知道這結束後你一定會去自來水廠，因為你一向這樣，一向想幫助別人。別擔心，我瞭解，因為你是扶輪社員。」

多利安颶風狂掃 30 幾個小時。它就停在我們的正上方。我經歷過好一些颶風，它卻是我前所未見。隔天，我來到那個運用扶輪基金會獎助金興建的自來水廠半路時，遇到警察來護送我前往。當我們抵達自來水廠時，大約已經有 200 個人帶著水罐。警方必須從人群中清出一條路讓我通過。

當我打開門，我知道我們有麻煩了。一加侖裝的水罐



四散各處，這表示抽水幫浦的電動馬達泡在水裡。我潑了些水在上頭，噴了一些電子接點清潔劑，用柴油潤滑。然後我啟動開關，機器開始運轉。我們在造水了。

身為扶輪社員最了不起的一點救災。我們在颶風後拼拼湊湊，建立了一個系統。我們那裡的助理總監麗茲·諾爾斯 Liz Knowles 負責一切。在自來水廠對面，大巴哈馬日出 (Grand Bahama Sunrise) 扶輪社的克里斯托·萊伯恩 Christel Lightbourne 籌設了一處倉庫，當作食物及衣物的分發站。魯卡亞 (Lucaya) 扶輪社社長詹姆士·凱瑞 Jaims Carey 負責把物品分送

給因為失去車輛或不想離開家當的人。魯卡亞扶輪社的比利·珍·佛古森 Billy Jane Ferguson 負責救災物資分類中心。而日出扶輪社的詹姆士·撒勒斯 James Sarles 製作影片四處轉發，協助我們募款。他算是我們的物資專員。我們也有個別的扶輪社員來島上幫忙清理，他們也聽說過自來水廠的事。此外，我還接到瑞典、德國、溫尼伯格 (加拿大)、多倫多、芝加哥、及加州的扶輪社來電，送給我們補給品和資金。令人感動不已。我連現在講起都要強忍眼淚。

我家幾乎整個滅頂了，我們的家當也差不多。我們的果樹本來結滿芒果、酪梨、

麵包果、楊桃。一切都淹沒在 6 英尺的水面下。每天都不一樣。有些日子好，有些日子不好。你會笑，會哭，會情緒化。然後你會發現還是有好事，像是你在角落找到你的第一枚保羅·哈理斯別針。後來又在房子的另外一頭找到第二枚保羅·哈理斯別針。然後當你在清理東西時，又找到第三枚。現在你真的開心，你明白我們一定會撐下去。

口述由 Frank Bures 整理

國際扶輪已經建立一項基金來支持未來的災難救助。
詳情請見 rotary.org/disaster-response。



那是什麼感覺……

捐出腎臟給朋友

茱莉·史潘 Julie Spann

紐約州菲雪基爾
(Fishkill) 扶輪社

我認識史圖靈 Sterling 很多年了。他是我擔任館長的圖書館的理事會主席。他從圖書館職務退休，可是一直是扶輪社員，我在他的敦促下，於6年前加入。我知道他需要一顆腎臟，他已經登錄受捐贈名單，我知道我自己想要成為捐贈者。可是當時，我在照顧我生病的母親，我知道那麼做會負擔不了。後來，我母親過世了。

我等了幾個月，然後我去找史圖靈的太太克莉絲 Chris，告訴他我有興趣捐一顆腎臟給她先生。我去找克莉絲是因為我不知道史圖靈是否會接受我捐贈。我擔心他會感覺過意不去。可是我知道克莉絲會同意。

做血液檢測時，我知道就統計數字來說配對機率不高，因為只有極小部份的非親屬捐贈會相符。我通常運氣不佳；我有點算被莫非定律牽著鼻子走。我也知道我可以把腎臟捐給別人，這會讓史圖靈在等待名單的順位往前移，讓他可以早一點得到他人的腎臟。我就是打算捐出去，因為我想要幫助別人。可是事情該怎麼樣，就會怎麼樣。我們最後相符的程度是六分之五，我們就著手開始進行。

至於我家人的想法，我母親應該是唯一會反對的人，那就是我等她往生的原因。起初我哥哥對整件事有一點憂心。可是我把過程解釋得越詳細給他聽，他就越能明白我為何這麼做。我很開心能當捐贈者，那也讓我的朋友很開心，他們不想掃我的興。

我不是個會去思考長遠未來的人，因此我不擔心只有一個腎臟的生活。那從來不是我害怕的事。可是我倒是蠻害怕打針和醫生。我以為這次手術可以幫助我克服這些恐懼。結果沒有，反而是因為目標崇高偉大所以我並不緊張或害怕。我知道事情一定會順利。當他們來做靜脈注射時，好吧，我是有一點緊張。可是我真的是靠自己進入手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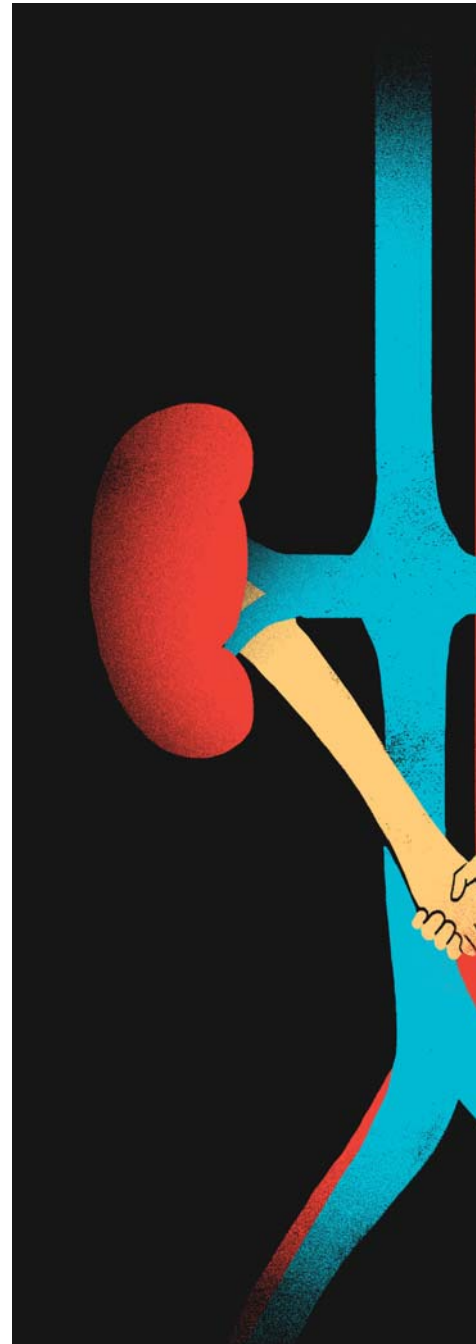
三、四個星期後我才完全復原，花了一整年才恢復體力。至於史圖靈，他狀況很好。他在手術前有高血壓，之後血壓就下降，所以我們喜歡開玩笑說是我把他的血壓降下來因為我天生血壓偏低。他的確更有精神。在手術滿一週年時，史圖靈和克莉絲送給我一條蒂芬妮 (Tiffany) 項鍊，墜飾是腎臟形狀的，很難相信吧。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擁有蒂芬妮的東西。

我跟克莉絲談了很多；對我來說她就像媽媽一樣。我每星期三在扶輪見到史圖靈。我喜歡去那裡。我真的認為我是因為扶輪影響才想成為捐贈者：整個超我服務，設法幫助

別人的概念。

我從不懷疑我的作為的正確性。這是我所做過的最佳決定，也是少數幾個我有百分之百自信做出的決定。我一直跟史圖靈這麼說，如果我還有腎臟可以給，我還會再捐。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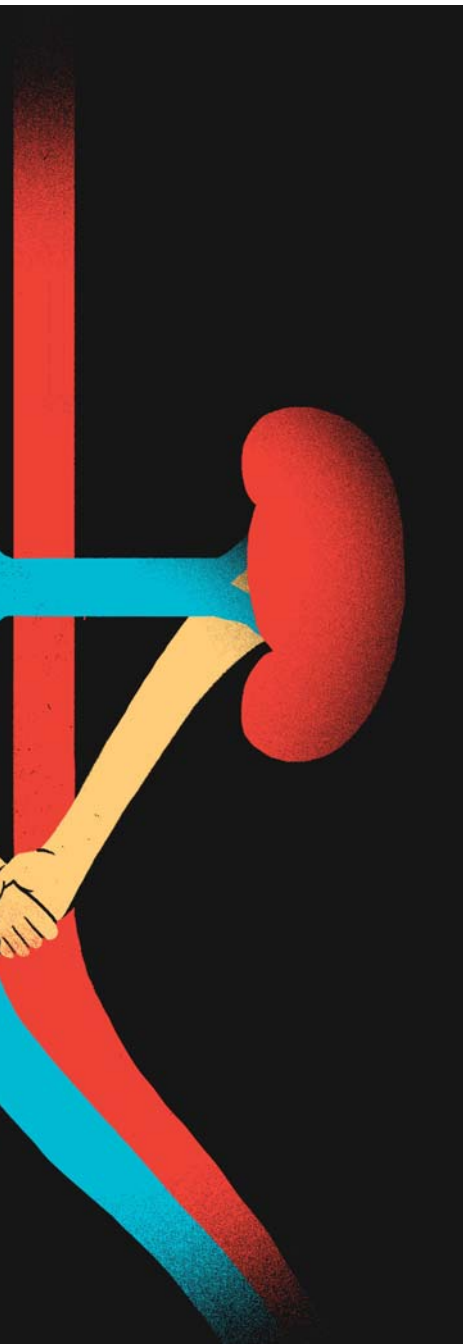


那是什麼感覺……

接受朋友的腎臟

史圖靈·加斯頓
Sterling Gaston

紐約州菲雪基爾扶輪社



我患有多囊性腎臟病。我哥哥和我都罹患此病，遺傳自我母親。它可能會造成高血壓及動脈瘤，我兩項都有。我的腎臟科醫師說：「如果你留意我說的話，吃我說的東西，並服用下列處方藥，你大概可以好好活 15 年腎臟才會出問題。」嗯，我遵照她所說，也確實平安過了 15 年。然後我開始出現不適。我接連發現腎結石，電腦斷層顯示我的腎臟有數百顆小囊腫。因此 7 年前，我去登錄器官等待名單。我知道我必須好好照顧我的腎，希望會在極度惡化前找到捐贈者。

幾年前，茱莉來找我太太克莉絲談捐贈腎臟的事。那是在菲雪基爾扶輪社的聖誕派對上。我可以看見他們倆在房間另一頭交談。可是你知道，那是個社交場合，我們都是好朋友，所以這沒什麼大不了。克莉絲問她：「你為何來找我而不是找史圖靈？」茱莉說：「因為我瞭解他。如果我去找他說：『我要這麼做。』」他會說：『不，茱莉，冷靜一下。我已經在等待名單上。』」她很可能說對了。她們兩個就聯合起來對我。我們就這樣開始。

我聘用茱莉在我擔任理事主席的圖書館當館長，大約已經 20 年。我們每天會聯繫，這些年來也培養出堅實的友誼。我最後還找茱莉加入扶輪。我們兩個都曾當過本社的社長。她是個非常熱心社區事務的人。可是她主動說要捐腎臟給我時，我還是整個驚呆了。坦

白說，她救了我。當時，我的腎臟已經惡化到幾乎只剩 8% 的效能。如果我沒有進行移植，就必須開始洗腎。

那時候，茱莉來找我，我不知道我們配對成功的機會其實很渺茫。可是器官分享聯合網的運作方式是如果你捐贈腎臟，你可以指定受贈者。如果你和那個人配對不成功，他們會把你的腎臟捐給另一個配對成功的受贈者，可是他們會把你指定的受贈者移到該血型名單的最頂端，有點像是接龍的概念。茱莉接受這種做法，這點讓我更加震驚。她的反應是：如果事情是這樣運作，很好，我會幫助到兩個人。她決心要這麼做，而且她想要為我這麼做。

我們兩個在同一天進開刀房。正常來說，他們會把捐贈的腎臟植入在你原有的腎臟旁。可是我的兩顆腎臟受損的程度嚴重到必須都移除掉。我住院 6 天。術後第一個月不是很平順，因為其中一種免疫抑制藥物造成胃痛。我在 17 天裡掉了 21 磅（約 9.5 公斤）。可是現在我只需要早上及下午各吃兩顆藥；大多數接受腎臟移植的人一天都要吃四、五次藥，所以這樣的配對成果已經算相當驚人。

大多數的捐贈者及受贈者不會保持聯繫。可是我和我太太經常和茱莉一起吃午餐或晚餐。我每個星期三早上會在扶輪看到她。我們之前的關係就很好，可是現在就更深入、更有意義。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那是什麼感覺……

開直升機飛入 歷史

強·史蒂爾曼
Jon Stillman

美國明尼蘇達州史提瓦特日出
(Stillwater Sunrise) 扶輪社

這是我第一次重述我在越南的經驗，打從我 1973 年回國以來。我最近找到一本我一直收起來的日記，讓我想起已經遺忘的三趟任務的記憶。

就讀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時，我並沒有興趣從軍。可是因為這是一所政府贈地的學校，傳統上男學生都要參加預備軍官訓練軍團兩年。在兩年結束前，我決定再留在這個計畫再兩年。之後我進入飛行學校，最後加入陸軍。

在喬治亞州班寧堡 (Fort Benning) 接受基礎軍官訓練後，我分發到阿拉巴馬州的洛克堡 (Fort Rucker) 接受直升機進階訓練。在那裡的期間，我奉命前往越南。那時是 1963 年 2 月。當時，沒人關注越南。大多數美國人甚至不知道它在哪裡。

我感到憂慮，主要是因為我要離開結縭兩年的妻子珍。在這第一次任務期間，我每天寫信給她，打過四、五電話。後來，在軍事輔助無線電制度實施之後，打電話回家就必須遵守無線電準則。這讓



私人對話顯得很彆扭：「我愛你，珍，over。」「我也愛

你，over。」

對於一個從沒出過國，



容易受影響的 25 歲年輕人來說，另一項擔憂是深入未知的

世界。那是一種文化衝擊：新的語言、新的宗教、新的植物、新的食物。所幸，我抵達時我的朋友已經在那裡，幫助我適應這個異國的環境。

在西貢附近的新山空軍基地，我被派任到第 57 運輸連，使用的是 H-21 直升機，一種俗稱「飛行香蕉」的舊型飛機。駕駛它們很有挑戰性，可是很有趣。它們的設計是要用在比越南涼爽的環境，駕駛需要高度專注力。這就是為何有時候我們甚至沒注意到我們被敵軍擊中。

越南的局勢在許多層面來說都很混亂。這場戰爭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有連成一線的戰場。西貢算是相當安全，可是離開這首都 10 分鐘後可能就會被擊中。越共戰鬥機有許多藏匿處很難鎖定。我也有種感覺就是你理應幫助的人並不想要你的幫助。

6 月時，本連被重新編制為第 120 飛行連，我們開始載送越南共和國軍人去打仗。南越的士兵通常很友善，雖然碰到美國人顯得有些膽怯。他們似乎為使命而戰，雖然有些將軍顯然是政治任命，缺乏作戰知識。這令人感到挫敗，因為這往往讓越南共和國軍留下一條生路讓越共逃走。

從 8 月 2 日到 10 月 4 日，我駐守在中部高地。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該山區的部落民族「高地族」。我們顧問試著把他們拉攏到我方。在我們和村落長老會面期間，受邀參加

慶典。穿著丁字褲的男性坐在高腳屋裡，以銅鑼敲打節奏。他們傳遞一杯上頭加了樹枝及河水的米酒。我拒絕喝那個東西，因為我要駕駛飛機。

9 月底，我參加國防部長羅伯·麥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 的簡報。他和他那幾個「神童」來越南進行事實調查。他們是搞統計數字和管理的專家，擔任他的顧問。他問的問題和對統計數字的瞭解讓我佩服。然而，我不確定他那一套企業管理的方式對國防體系是否有用。

在簡報後不久，我回到西貢進行秘密任務，備戰 3 個星期。我們進行撤出美國大使館人員的演習，在空軍基地看到一卡車一卡車的士兵。我早該明白有大事要發生了。11 月 1 日，在推翻越南吳廷琰總統期間，直升機升空在西貢上方監視。

我的第一趟任務讓我大開眼界，雖然它留下許多疑問。我們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呈現我們國家的正面形象。我們努力贏得人心及認同，讓我們祖國的年輕人不必來越南打仗。

口述由 Alain Drouot 整理

扶輪退伍軍人國際聯誼會的會員努力促進和平。加入方式請見 rotarianveterans.org。

那是什麼感覺……

給緊急反應人員舒適的環境

泰德·莫里斯
Ted Morris

清水 (Clearwater) 扶輪社，
佛羅里達州

我們在星期天（2016年6月12日）一覺醒來看到新聞報導說，當地一家夜總會發生槍擊事件。在前往教堂路上，我們看到直升機在奧蘭多市中心上空盤旋。我們到達時，得知已有50人死亡，包括兇手。

我的妻子帕瑪拉 (Pamala) 和我派駐在奧蘭多的救世軍。我們有一個緊急食堂——一輛食品卡車——每天可以提供1,000份餐點。我們主動表示願意幫助首先到達的緊急

反應人員，市郡官員幾乎立即接受。

食堂備貨充足，到中午已經集合了一組工作人員。經過簡短的祈禱後，我們來到槍擊現場，員警已經封鎖了幾個廣場。他們揮手示意我們通過，我們把車停在離脈動 (Pulse) 夜總會約一個街區的地方。我們擺好桌子，開始提供食物。

隨著溫度的飆升，我把幾瓶冰水拿給了巡邏車裡的警察。當我經過夜總會的門前時，我看到一些有編號的塑膠小帳篷形立牌，我理解這些是用來標示彈殼位置。雖然我已經清楚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眼見那些小帳篷我才看到了情況的嚴重性。這些人正玩得興高采烈時，現場突然亂成一團。我看到明目張膽的邪惡的結果，並痛心疾首地意識到生

命的脆弱和寶貴。

我們的團隊在那一天接下來的時間都留在現場。一小隊人通宵供應咖啡和甜甜圈。有人問我們打算待多久。我說：「只要有緊急反應人員在這裡，我們就會在這裡提供食物給他們。」

翌日，該市搭了兩頂大型空調帳篷。其中一個是緊急反應人員的休息帳篷。我們其餘的人都尊重那個帳篷的神聖性，從未進去過。我們用另一個帳篷來供應當地餐館捐贈的食物。笑聲不多，但心情並不病態。我們為員警、穿著磨砂法的法醫、穿著印有FBI和ATF夾克的幹員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遠離可怕的任務，好好享受一頓飯。有一名志工為每張桌子帶來了紅白相間的格子桌布和盆栽。這使得氣氛大大改變。有一種平靜的感覺，一種和平的感覺。

我們一天走去夜總會3次。牆壁上佈滿了彈孔，有一個大洞是特警隊衝進大樓時造成的。我們手牽手圍成一圈站著，每個人都為死者家屬、醫院的傷員以及所有緊急反應人員禱告。

在現場調查的9天中，我們提供了6,300多份餐點和26,000份飲料。很榮幸能在那裡，去接觸經歷這種混亂的人們的生活。對我們所有人而言，能在其中扮演一個小角色是有意義的。我們的人生將與過去不同。



那是什麼感覺……

體驗車諾比 事故的餘波

赫弗·哈卡德
Herve Hacard

迪南 (Dinan) 扶輪社，法國

2003 年的一個晚上，我的妻子安妮克 (Annick) 和我在閒聊當天的工作情況。我說：「對了，我需要至少離開幾個星期去出一個任務。」「去哪裡？」，她問。「車諾比，」我回答。「但願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她說。

我服務的公司已經簽約管理民用核能史上最嚴重的災難的善後工作。1986 年 4 月 26 日，在烏克蘭北部，多起爆炸和大火摧毀了車諾比核電站的 4 號反應堆，將放射性物質噴入了大氣。我們被雇用來將用過的放射性燃料安全地存儲在現場。但是，在烏克蘭人報告了該過程中的缺陷之後，公司成立了一個團隊來評估情況。我是團隊負責人。

我們去了 4 次，第一次是在 2003 年 6 月。我們暫時住在發電廠以東約 45 英里的斯拉夫蒂奇 (Slavutych)，這是一個繁榮的城鎮，用來安置被疏散人員和清理現場的工人，以及一些因核災而流離失所的當地居民。事故發生 17 年後，這座城市已經顯示出嚴重的瀆職跡象。那年夏天，我

們住的酒店只有星期四才有熱水。

由於蘇聯解體，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不再屬於一個國家，這一事實使我們的工作變得複雜。現在，白俄羅斯有一小撮人站在斯拉夫蒂奇和車諾比之間，這意味著我們

必須過境兩次才能到達目的地，每天通勤時間增加了 3 個小時。

車諾比已成為研究核污染淨化問題的獨特場所。它仍然是一個真正的露天實驗室，我們可以在那裡研究放射性對土壤、植物和動物的影響。在我們訪問期間，我們看到大自然已經佔領了所謂的禁區。植物變得極為茂盛，到處都是鹿、野豬、狼和其他野生動植物。

我們得以參觀 3 座反應堆。第 4 個——那個爆炸的——是禁區。我立刻意識到，蘇聯為應對核災危機所做的，我們無法做到。安全問題不允



許這麼做。這種魯莽的行為仍在進行著：一名急於向我展示一些損壞的液體燃料的員工沒有戴防護手套就抬起了鋼門。

最感人的一刻是，我們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瓦列理·霍德姆丘克 (Valery Khodemchuk) 的名字，他是車諾比核電廠的一名工人，在 4 號反應堆爆炸時當場死亡。他是第一個死亡，但他不會是最後一個。控制室的操作員做了他們應該做的去處理事故。他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口述由 Alain Drouot 撰寫

那是什麼感覺……

從密西西比河 源頭划獨木舟 出海

埃里克·埃爾塞亞
Erik Elsea

珊瑚角 (Cape Coral)
扶輪社，佛羅里達州

當我 9 歲時，我父親和我在伊利諾州南部的沙特爾堡 (Fort de Chartres) 附近露營。我們徒步走了一些路，密西西比河在我們腳下流過。我說：「哇，要是有一天划獨木舟遊整條密西西比河，那不是很酷嗎？」我爸爸沒說那是個瘋狂的想法，反而說，「這是有可能的。你可以去做。」從那時起，我一直夢想著從密西西比河源頭划獨木舟到大海。

2018 年 7 月 7 日，即我 40 歲生日後大約 7 個星期，也就是我完成了扶輪社社長的任期之後的幾天，我開始實現自己的夢想。我那時在明尼蘇達州的艾塔斯卡湖 (Lake Itasca)，密西西比河的源頭，划著一艘 17 英尺長的紅色探礦號，這是由新工藝公司製造的獨木舟，用這一種叫 Tuff Stuff 的塗料塗船身。有一些相當不錯的急流從艾塔斯卡湖湧出來，大多數人都抬著舟繞過它們。我想，他們說這艘獨木舟是用堅硬的材料打造的。讓我們瞧瞧。

我開始划船，使盡全身力氣，衝進了急流。我開始從岩石上彈跳起來——轟隆隆！轟隆隆！轟隆隆！我想到這也許不是最好的主意。但結果我表現不錯。

我對這條河的印象一直是我成長時期的聖路易斯附近的樣子——巨大而壯觀的密西西比河。河的北部不是那樣的。第一天的河道非常狹窄，兩岸河邊濕地甚至同時碰到了我獨木舟的兩側。這裡的密西西比河美麗，風景如畫，非常原始。

我這次旅行的一個原因是為了幫庇護箱組織 (ShelterBox) 籌錢以及提高人們對扶輪在救災中的這個夥伴的認識。我是庇護箱的大使，荷莉·安德森 (Holly Anderson) 也是，她是北達科他州法戈摩爾黑德 (Fargo Moorhead PM) 扶輪社的成員。荷莉是我的組長，她非常棒。我可以划船——全程 2,350 英里——但是荷莉做了所有的後勤工作，協助找到贊助商，並在一些扶輪社和其他地方安排了關於庇護箱的演講活動。

我的每一天一般都從日出之前開始。我會燒一些水，泡一些即溶咖啡，然後吃早餐。然後，我會拆營地、裝載獨木舟，並在日出後不久上河面。我會一直划獨木舟到接近日落，然後搭營地、做晚餐。我有一個凡戈 (Vango) 帳篷，和庇護箱裡用的一樣，但

尺寸較小。作為庇護箱大使，我曾在歷次示範時搭了許多多帳篷。在野外搭一頂是很有趣的。

總的來說，我很幸運都遇到好天氣。但是有一天，我試圖加快速度來避開一場風暴，可是突然間風暴就降臨我頭上。我跑到河岸，把獨木舟拖到河灘上，翻過來，然後爬進去下面。閃電和雷聲在我頭上劈裂開來。當你獨自一人時，無論你對上帝的看法是什麼，你對上帝說話之多真是令人驚訝。我會說，「好吧，上帝，請讓我平安度過這場風暴。」

每天晚上，我都會讀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書中是吐溫在 19 世紀討論這些河畔城鎮，我將在 2018 年看到那些城鎮。我到了密蘇里州的漢尼拔 (Hannibal)——馬克·吐溫的家鄉——正好在我 90 天行程的中點。那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幾天後，我抵達達聖路易斯。與家人一起聊天後，我從蓋特威 (Gateway) 拱門出發。那是在河上最瘋狂的一天。聖路易斯港是一個危險，危險的地方。河上的交通很擁擠。河中有很多北行駁船和南行駁船、拖船和遊輪。波濤洶湧，為了寶貴的生命我雙手緊抓住獨木舟。

10 月 4 日，我抵達路易斯安那州的伊德斯港 (Port Eads)，新奧爾良下游約 100



英里處。從那裡到墨西哥灣大約 2 英里。第二天我起得超早。那是一個美麗的早晨，我想看到太陽從海灣升起。普拉克明斯 (Plaquemines) 港務局派了一艘救援船尾隨我，當我到達海灣時，水炮鳴響、燈光閃爍、汽笛響起。第二天晚

上，在新奧爾良的藍調之家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聚會。荷莉出席了，還有很多扶輪社員和來自庇護箱組織的人。

人們問我是否再次划獨木舟遊密西西比河。不！我已經划過一次；我為什麼要再划一次？現在，我要到亞馬遜

河、尼羅河或育空河划獨木舟。那是我現在的夢想。

口述由 Geoffrey Johnson 撰寫

如要詳細了解扶輪與庇護箱組織的合作關係，請至 my.rotary.org/en/learning-reference/about-rotary-partners。

那是什麼感覺……

會晤未來的 天皇

格倫·亞當斯
Glenn Adams
團體研究交換

去年春天，85歲的日本明仁天皇從菊花皇座退下，此事勾起我對於40多年前在皇宮與他會面的回憶。

1978年4月，我參加了扶輪贊助的6人團體研究交換活動；日方隨後將派代表團來我們費城地區。由於扶輪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地位，我們在為期6週的訪問中備受一流禮遇：我們住在四星級酒店，餐飲奢華，還乘坐車前擋泥板上掛著小旗子的黑色豪華轎車到處去。我們參觀了農業和製造業、東京築地魚市場——當時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及相當於美國國會的國會大廈。當我們乘坐古董船在江戶河上航行時，我們享受了在我們航行期間捕獲，去內臟、去鱗，然後油炸的魚的午餐。在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堅持要求我們試穿他的長袍；在相撲學校，我們坐下來吃典型的摔跤選手午餐，有啤酒、兩條清蒸魚、海藻、生黃尾魚、涼湯、黃豆年糕以及麵條。

我們最難忘的短途旅行

之一始於從東京乘坐火車。我們經過村莊和梯田。隨著群山越來越近，我們轉乘了三輛黑色計程車，沿著陡峭曲折的道路，我們到達纜車，這台纜車載著我們翻越廣闊的雪松森林。我們在一個閃閃發光的藍色湖泊蘆之湖(Ashinoko)下纜車，我們乘著一艘複製的17世紀船橫渡這個湖。隔日黎明我們看到富士山白雪皚皚，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美景。



我們期待已久與當時皇太子明仁的會面在皇宮有松木鑲板的廂房裡舉行，他父親裕仁(Hirohito)將再當11年的天皇后退位。當他進入時，我們的扶輪地主虔誠地鞠了一躬，我們也鞠了一躬，因為之前已上過皇家禮儀速成課。明仁穿著一件普通的藍灰色西裝，白色襯衫和深色領帶。他說話輕聲細語，他的英語很好，但說

時小心翼翼。根據我的日記，「在按年齡順序介紹我們每個人時，他鄭重地凝視著每一個人。」

我們坐在一對漆著黑色亮漆桌旁的紅椅上。桌上擺了四個煙灰缸、印有皇家標誌的火柴盒，以及裝在銀色托盤上的煙盒，但我不記得會談期間有人抽煙。在我們說話時，御僕帶來了幾盤糖果和綠茶，每次都不直視太子就鞠躬。明仁詢問我們對日本有何印象，我們提到了人民彬彬有禮、東京街道之乾淨、我們參觀過的歷史遺跡以及我們有幸享用的美食。我在日記中寫道：「大部份時間太子幾乎毫無表情。」

知道我們來自費城後，明仁回憶起1953年他19歲時訪問過那個城市。當我問他他認為日本人民最關心的是什麼時，他回答說，那就是維護日本的傳統、歷史和文化，同時將它們與現代潮流和技術相結合。

訪問結束時我們祝福太子，並再次向他鞠躬。如果說我們的談話有主題的話，那就是要在現代維護古老的習俗——明仁不斷提到的一個詞是：「和諧」。

透過扶輪友誼交換來瞭解其他文化。關於詳細資訊，請參見 rotare.org/friendship-exchange。

那是什麼感覺……

與第一夫人一起 在蝴蝶園種樹

克里斯·普托克
Chris Puttock

大學公園 (College Park)
扶輪社，馬里蘭州

2010年4月，我接到了白宮某個辦公室的電話。國會議員配偶們想和蜜雪兒·歐巴馬 (Michelle Obama) 一起在華盛頓特區的瑪麗里德 (Marie Reed) 小學設立一個花園。才提前13天通知而已，他們說，「我們有可能弄好並成立這個花園嗎？」我說，「高難度，但我們做得到。」

我是唸植物學的。我在澳大利亞雪梨獲得學位，在到史密森尼學會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當研究員之前，我是夏威夷主教博物館的植物收藏經理。我也是環境可持續發展扶輪社員行動小組的組長。2009年左右，我在華盛頓扶輪社遇到一位名叫威廉·登特 (William Dent) 的扶輪社員。他是與帝王姐妹學校計畫合作的自然夥伴 (Natural Partners) 組織的執行董事。他正在尋找一個能設計花園並把它放入學校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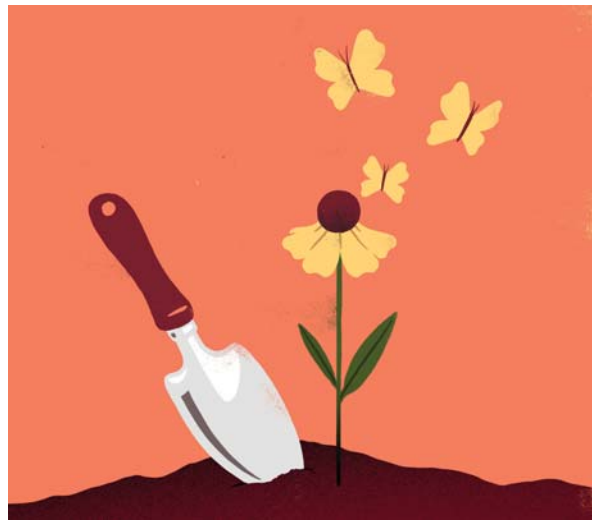
短短的13天要張羅所有的植物、規劃花園、準備花床。但是我們能夠做到。我提出了植物在花園中種植位

置的圖樣。然後，載著600或700株植物的卡車來了，我們把它們都擺出來，還有工具、手套和孩子們需要的所有東西。

當天下午，蜜雪兒·歐巴馬與國會配偶小組抵達。他們戴上手套。他們當中有些人會種植。有些人在澆水。在某個時點，蜜雪兒和我一起在地園的一角工作。有幾個孩子在幫助我們，所以我們討論了如何在要植入植栽的地方挖洞，如何從盆中取出植栽以及如何澆水。

她懂得園藝。她一直以來在白宮與園丁一起做園藝工作，並在那裡種菜。在我設計的花園中，大部分都是原生植物，但有一區基本上是做披薩用的植物：辣椒、番茄、和羅勒。我們談到了菜園與蝴蝶花園的差別，後者是為毛蟲提供食物，為蝴蝶提供花蜜。

花園面積約750平方英尺，我們種植了大約30種原產於華盛頓的植物：車前葉狀貓指草、普通馬利筋、紫頭堆心菊。如果要吸引蝴蝶，必須有提供花蜜的植物。他們喜歡帶有一點糖分的小管的植物。蝴蝶和飛蛾會在特定種類的植物上產卵。帝王蝶只會產卵在馬利筋上。但是牠們失去了太多的棲息地，以至於目前數量



不到50年前的10%。某些年份，數量可能低至只有歷史水平的1%。

蜜雪兒是一位可以共事的可愛女士。她還幫忙在花園旁邊的壁上畫了有蝴蝶和植物的畫，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大約一個半小時後，她和這群配偶一起離去。

市中心學校的蝴蝶花園可以為孩子們帶來自然的家園。要教孩子認識特定生物的需求，最簡單方法就是透過蝴蝶。魅力十足的帝王蝶在教室裡是出色的大使。現在，帝王姊妹校計畫已有10多年的歷史了，並成立了許多花園；我在那個計畫時，我們在三年內成立了約30個花園。有幾個扶輪社仍在參與這個姊妹校計畫。

口述由 Frank Bures 撰寫

有興趣更深入瞭解原生植物園
和類似專案嗎？請到
esrag.org 瞭解環境可持續性
扶輪社員行動小組。

那是什麼感覺……

診斷改變人生 後的冒險

琳達·穆爾琳
Linda Mulhern

明尼蘇達州聖保羅
(St. Paul) 扶輪社，美國

1975年，我被診斷出患有I型糖尿病。當時，我的醫生告訴我，我還有20年可活，如果我不照顧好自己，我的身高將來會矮於六英尺。我那時12歲。

我記得祖母來醫院看我時，她眼中含著淚水。她在1920年代開發胰島素治療之前就已長大，因此她想起了被診斷患有糖尿病的孩子去世的日子。醫生束手無策，幫不上這些孩子。

我母親是一名護士，在管理疾病方面非常實事求是。她確定讓我知道我有責任服用胰島素、注意飲食和鍛煉身體。如果我需要她的話，她隨時會在身旁，但我要負責管理自己的健康。她說得很清楚。

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我不會讓糖尿病阻礙我。如果我真的只有20年可活，我要讓這20年活得有意義。我踢足球和玩其他運動，我參加校園劇演出，我加入了演講隊。但是我想進行一次更大的冒險，因此我向一個國際學生交流組織申請到國外讀高三。但



是在得知我患有糖尿病時，他們拒絕了我。將患有慢性病的學生送往國外，風險太大了。

然後，我母親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小廣告，說我們當地的扶輪社正在尋找學生申請他們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我提交了一份申請書，而且非常直言不諱：我告訴他們我患有I型糖尿病，但我知道如何照顧自己。我不在乎去哪裡，我只是希望我能被接受。他們先將我的申請書轉發給阿根廷，然後再轉發給南非。但是我被拒絕了。隨著夏天的來臨，我似乎不可能在國外唸未來這一年。

6月，該社有幾位社員參加了1979年國際扶輪年會。在一次會議上，他們解釋說，他們想將一個患有糖尿病的女孩安置在寄宿家庭中，但找不到一個地區可接受這個風險。令他們吃驚的是，一位來自瑞典的扶輪社員站起來說：「我有同樣的問題。您是否有興趣和我們交換？」

在那之後，一切都很快發生了。我於1979年8月9日離開。我只知道我要去瑞典的瑪麗斯塔德 (Mariestad)，一個叫卡琳·基爾伯格 (Karin Kjellberg) 的女孩要來明尼蘇

達州。我們各自會和對方的家人住在一起一年。

要走的那一天，我感到非常興奮。我父親的家人已經從瑞典移民到美國，看著地圖，我們發現我要去的地區就是曾祖父母的家鄉。我甚至在附近有3個表兄弟。感覺超現實——一位曾孫女要回家了。

我在瑪麗斯塔德鎮上學，但我的寄宿家庭住在鄉下的莊園。我最喜歡做的事之一是和我的2個寄宿姐妹一起散步一大段路，她們比我小幾歲。

我們經常看到麋鹿和鹿。我在聖保羅的郊區長大，所以去外面看野生動植物實在令人激動。我們會在鄉間閒逛，採摘杜松子和藍莓。

當我的寄宿家人坐下來吃飯時，他們從來不急。我們喜歡吃用蒸鍋蒸出來的肉丸子和馬鈴薯，還有我們親自挑選的蘑菇或漿果製成的調味醬。我來自一個吃飯匆匆忙忙的家庭，我們必須去看足球賽。但是卡琳的家人會坐在那裡一個小時，只是閒聊而已。我很喜歡和他們談話，儘管起初我聽不太懂。但到了耶誕節，我做了一個瑞典語的夢。

在我老家，卡琳加入了足球隊。她去參加舞會。她第一次嚐用奶油夾心蛋糕。到達美國時她很害羞，但人們對她的好奇心使她變得更有自信。我父親是我們鎮的鎮長，所以她透過他認識了很多人。他教她美國政府如何運作，並在她發現不同之處或奇怪之處時回答了她的問題。我的弟弟是一個典型的十幾歲的男孩，問她是否知道「超級酷斃宇宙世界霹靂無敵棒 supercalifragilistic expialidocious」是什麼意思，並教給她所有她在英語課上學不到的不適當的單詞。但他們變得非常接近。卡琳沒有兄弟，她很喜歡和他在一起。當他結婚時，她甚至飛來參加婚禮，讓他大吃一驚。

我們回家的時候，我們倆都不一樣了。我們在一年的時間裡成熟了大約四年。我們沒有發生與糖尿病有關的併發症，我很感激疾病沒有妨礙這種體驗，因為那一年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人生。我後來加入扶輪社，到現在已接待了來自27個國家的青少年交換學生。我的兩個孩子都在國外讀書。卡琳住在布魯塞爾，在歐盟工作，協助管理一項名為「伊拉斯加 (Erasmus Plus)」的交換計畫。我們仍然會互寄聖誕賀卡，卡琳每年都會在我母親生日那天送花。我們有著很少人有的關係。

口述由 Vanessa Glavinskas 撰寫



分享你的故事

這是《那是什麼感覺》第5個年度亮相，它被證實是扶輪內外讀者的最愛。如果你是一個有精彩故事的扶輪社員，或者你認識扶輪有聯繫的人有一個奇妙的故事，我們想聽聽。注意未來《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最佳故事。請把故事寄到 rotarian@rotary.org 與我們分享。